

东亚

社会价值的 趋同与冲突

中日韩青年的
社会意识比较

主编：〔日〕君塚大学
〔中〕吴鲁平
〔韩〕金哲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

——中日韩青年社会意识比较

[日] 君塚大学

[中] 吴鲁平 主编

[韩] 金哲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日韩青年社会意识比较 / (日) 君塚大学, (中) 吴鲁平, (韩) 金哲秀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3

ISBN 7 - 80149 - 504 - 7

I. 东… II. ①君…②吴…③金… III. 青年 - 社会意识 - 对比研究 - 中国、日本、韩国 IV. D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55 号

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

——中日韩青年社会意识比较



主 编：[日]君塚大学 [中]吴鲁平 [韩]金哲秀
责任编辑：张大伟
责任校对：同 文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东远先行彩色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北京隆华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1.875

字 数：290 千字

版 次：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49 - 504 - 7/B · 087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人类社会的全球化现象，进入 21 世纪后，将会进一步扩展。另一方面，全球性的认知，在别的方面，也会联系到，如对于空间上并存的、各地区的、地方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传统所进行的比较和再认识。

这是一部根据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比较调查的结果，是对东亚地区的全球化现象以及对随之而来的、对地方性社会、文化传统的再评价这个貌似矛盾的现象，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

这项研究是由我所（日本佛教大学综合研究所）“日韩中三国青年社会意识调查”课题组进行的。始于 1998 年，历时三年，尤其于 1999 年在日本、韩国、中国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青年社会意识调查。书中收集的论文，是以这次调查结果的分析为主，以补足性论文为辅的。第一部分概观了三国青年社会意识调查的目的、方法及其主要发现，第二部分收录了出于研究员各自的分析和考察的 11 篇论文，第三部分收录了问卷调查方法、单纯交叉统计表（国别、地区别）和调查问卷。我希望这次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日韩中三国之间的理解。

最后，借此机会，对那些给本次研究项目以巨大支持的人士和有关机关，深表谢意。尤其对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社会调查所、河南省青少年研究所、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

2 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

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韩国芜俚社会研究学会、韩国全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各位人士，由衷地表示感谢。

2001年1月10日

佛教大学综合研究所（日本）

所长 丸山哲央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部分 “中日韩三国青年社会意识调查”课题总报告

一、研究过程和主要目的	1
二、研究方法	4
三、调查结果与主要发现	10

第二部分 分报告

君塚大学	东亚价值观趋向——“文明的冲突”与儒家文化	15
金 哲 秀	社会发展和社会意识——以“中日韩三国青年生活观与社会意识调查”为主	40
宋 正 基	东亚发展和儒家价值小考——基于对	
朴 珉 俄	中日韩三国青年群体的调查	68
星 明	中日韩青年不公平认知的特点	98

2 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

吴 鲁 平	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和后现代价值观能否同时并存? ——中国青年价值结构的“多重性”及其中日韩青年价值结构模式比较	120
大束贡生	东亚地区青年的社会性别意识——以家庭群体为中心	151
山 口 洋	中日韩青年的亲子关系、朋友关系的性别差	174
大桥松行	现代青年的家庭观念——中日韩三国的比较分析	193
近藤敏夫	中日韩青年的集体主义态度——以家庭和亲族群体为中心	217
张 萍	中国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与青年社会意识的形成	243
罗 红 光	小家庭中的大社会——中国陕北杨家沟村民围绕财富的公共意识的行为机制分析	271

第三部分 问卷调查：方法与结果

一、方 法	305
附录 1-1: 北京市大学生抽样方法及其结果	305
附录 1-2: 北京市职业青年抽样方法及其结果	309
附录 1-3: 河南、山东农村青年抽样方法及其结果	310
附录 1-4: 日本大学生抽样方法及其结果	311
附录 1-5: 韩国大学生抽样方法及其结果	312
二、结 果	313

附录 2: 中日韩三国青年生活观与社会意识调查初步 统计数据 (分国别、分地区统计表)	313
三、问 卷	350
附录 3: 中国、日本、韩国三国青年生活观与社会 意识调查问卷 (大学生问卷)	350
后 记	367

第一部分 “中日韩三国青年社会意识调查” 课题总报告

一、研究过程和主要目的

“中日韩三国青年社会意识调查”国际合作课题，最早是由日本佛教大学的星明教授、君塚大学教授等于1998年上半年提出来的，当时笔者正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社会调查所工作。在我表示愿意参加这项合作调查之后，于当年7月应邀去佛教大学参加“中日韩三国青年社会意识研讨班”，并就当代中国青年的现状及其特点等作了4次演讲。在这次研讨班上，成立了“中日韩三国青年社会意识研究课题组”，组长由君塚大学教授担任，星明教授任秘书长。该课题被正式列为1998~2000年佛教大学综合研究所重点课题，同时也被笔者当时所在的单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列为1999年度个人类课题。在这项国际合作课题研究中，本人既是课题组成员，也是中方调查实施的具体负责人和协调人。

从课题的提出到课题结束，历时整整3年。这3年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从1998年初到1999年3月。这一阶段为课题的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除前面提到的研讨会之外，还组织了两次重大活动。一次是课题组的日本和韩国学者于1998年9月到北京做有关的学术交流访问。日韩学者先后与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社会调查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青少年研究室的同行进行了交流。在此基础上，设计并反复修改了调查问卷。为了保证调查的质量，尤其是保证抽样方法和测量工具——问卷的科学性，1999年年初，课题组成员在佛教大学召开了有关的研讨会，专门就抽样方法和问卷设计的科学性及本土化问题展开了讨论，对原问卷做了进一步地完善和修改；第二阶段：即从1999年3~6月。这一阶段为问卷调查实施阶段；第三阶段：即从1999年7月~2000年12月。这一阶段为数据分析和报告撰稿阶段。为了做到对数据做准确的分析，课题组成员于1999年8月和2000年8月亲自到河南、山东被调查地区的农村，与部分青年进行了交谈。此外，在此期间，还于1999年10月和2000年2月分别在韩国全北大学和日本佛教大学召开了数据分析研讨会。所有这些都为课题组成员保质保量地完成本书第二部分的分报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必要指出的是，2000年3月，本人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后，中方课题合作的单位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即从佛教大学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合作，变为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合作。2000年8月，三国学者在山东对农村青年所作的访谈，其邀请单位和协调单位是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外办实施的。

目前，这一合作课题已初步告一段落。三国学者为什么要花费三年的时间来从事这样一项国际合作课题呢？它的目的和意义何在呢？

根据笔者自己的体会，该课题研究的目的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面对现代化，尤其是当代世界出现的经济一体化或全球化浪潮，历史上曾经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东亚国家，他们的青年人的心理世界目前是否还存在传统的儒

家价值观？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价值观的趋同化（其本质是“西化”）。中国大陆也有学者宣称，儒家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历史。并认为，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儒教文化圈中的文化特性将迅速地消融于西方文明之中（王小东，1997）。那么，实际的情形究竟如何呢？这是本次调查研究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与上述观点相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很可能由文明的冲突引起。而最有可能与西方文明发生冲突的是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那么，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东亚年轻人，是否具有与西方为敌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呢？这是本次调查研究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世界价值观调查研究表明，从一个较长时间的跨度来看，一方面，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受到该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任何价值观和社会意识，一经形成，又对该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放慢，与文化价值的变迁，即从现代价值观转向后现代价值观相关（Inglehart, 1997）。日本的研究资料也表明，8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其原因之一便是日本青年在价值层面出现了“后现代化”趋势，即“认真”价值观崩溃（千石保，2000）。当然，后现代价值观的兴起，也具有许多好处。如宽容、强调环境保护等。那么，在中国和韩国是否也出现了后现代价值观？这便构成本次调查研究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

此外，中日韩三国青年在价值观和社会意识方面存在何种差异，也是本课题研究要重点回答的问题之一。

二、研究方法

(一) 调查对象的年龄界定

在日常生活和大众传媒中，人们所说的青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即使是在有关青年问题研究的学术领域或实际工作领域，“谁是青年”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从定性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不去界定青年的年龄上限与下限，可以在非常模糊的意义上使用青年概念。但是，当我们要对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国家青年的生活观和社会意识进行定量的测定时，则必须对其研究对象的年龄跨度做出精确的界定，否则，会导致许多不必要的争议。因为在中国，人们常常将35以上，甚至45岁的人，还视之为青年（如青年企业家等）。

国内外学者有关青年年龄的界定，存在着不小的差异（黄志坚，1988）。

青年的年龄界定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对它进行界定，首先必须界定青年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因为，青年的本质是青年这一概念的内涵，而青年的年龄界定则是青年这一概念的外延。

在80年代的国内青年研究领域和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领域，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将青年视为“社会化的一个阶段和向成人过渡”（Conceptually, youth has been defined in the sociological literature as a stage of socialisation and transition to adulthood）。即从童年向成年过渡；从不成熟向成熟过渡；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过渡。有的学者甚至还将就业、结婚视为青年期结束而进入成年期的标志。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外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结婚（同居等），那是否意味着它永远就是青年呢？

近年来，欧美一些研究青年问题的社会学家从新的视角来对青年的本质进行重新建构（吴鲁平，1999）。他们将青年定义为“人生生命历程（或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阶段”（Youth is being re-evaluated as a central and strategic phase inside the life course）。在这一阶段，主体将获得最主要的社会资格能力（the main social competence and qualifications aquired）；作出那些影响他未来一生的重大选择和决定（the main choice and decisions determining the rest of the life course are made）。

这一青年本质的重新建构，对于青年年龄上限的界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既然青年阶段是一个获得最主要的社会资格能力的阶段，那么，当某一年龄群体的人已经获得了哪些社会中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应具备的资格时，他们就不再是青年，而进入到了成年（Adulthood）；其二，既然青年阶段是一个作出那些影响他未来一生的重大选择和决定的阶段，那么，不管他作的选择结果是什么，只要他在那些决定其终身的重大问题（如接受教育、就业、结婚并建立家庭等问题）上作出了重大选择和决定，那么，就有理由将他视为成人。例如，对于那些年龄较大，但仍不结婚而是选择同居的人来说，就有理由认为他们不再是青年。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现代社会因多元文化选择而导致的固定的、统一的标准失效问题。

根据西方社会学家重新建构出的青年本质及其中国社会目前的情况，笔者曾经撰文认为，联合国有关青年的年龄界定（将青年的年龄上限划定在 24 岁，下限划定在 15 岁）是可取的（吴鲁平，1999）。这是因为：

首先，青年的本质决定了青年阶段是一个接受教育，获得最主要的社会资格能力，并在教育、就业、婚姻家庭方面作出重大选择和决定的阶段。在需要作出选择和决定的重大问题中，婚姻家庭问题的最终选择和决定可以说是最迟的。因为在现代中国社

会，青年中比较普遍的成长历程是：先接受教育，然后再立业（参加工作）、成家（结婚建立家庭）。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的晚婚年龄男性为 25 岁，女性为 23 岁。无论是城市男性青年，还是城市女性青年，其平均初婚年龄都波动于晚婚年龄（而农村青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比城市青年更小。）。这意味着，目前中国的大多数青年是在 25 以前作出是否结婚建立家庭的选择和决定的。因此，将青年的年龄上限界定为 25 岁（不含 25 岁）以下是比较合适的。

其次，青年的年龄上限具体划在什么年龄，不仅要听取专家学者和其他有关方面的社会精英们的意见，更要看法律条文的规定。因为后者是对青年本质的一种更重要的建构。而在中国，有关方面的法律将 25 岁以下的犯罪主体所从事的犯罪活动称之为青少年犯罪。

因此，本课题将调研对象——青年的年龄上限设定为 25 岁以下。超过 25 岁的人，不属于本次调研的对象。而调研对象——青年的年龄下限设定为 18 岁（大学入学年龄）以上。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本次调查中，日本和韩国的样本全部都是大学生，为便于比较，所以，18 岁以下的中国青年，不在调研范围之内。

（二）抽样方法

1. 抽样的基本思路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而言，要保证被抽取的样本对于本国青年具有高度的代表性，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是，在采用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即 PPS 抽样）时，应将第一阶段的抽样数目，即 PSU 的数目确定为 30 个以上。具体说来，应以全国的所有区（省级或地级市中的区）、市（县级市）、县为抽样框，从中抽出 30 个以上（最好为 40~60 个）。然后，再从抽出的第一级 PSU 中来抽取第二级、第三级抽样单

位，直到最终抽出一定数量的个人样本。

但由于研究经费等方面的原因，上述方法显然不可行。因此，经三国学者的讨论，最后决定采用如下变通的办法。

第一，缩小抽样的地区范围。抽样不在全国范围进行，原则上各国只选取 1~2 个地区，并从中抽取一定数量的青年样本。在日本的调查地区被确定为京都。后因京都大学生的专业分布与日本全国的大学生分布存在一定差异，为了保证其代表性，在其邻近的大阪做了补足调查；在韩国的调查地区被确定为大邱和全北；在中国的调查地区被确定为北京。

第二，缩小抽样的群体范围。由于日本和韩国的大学入学率很高，两国青年升入大学的人数，占同龄人数的比例为 40~60%。大学生的生活观和社会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能代表他们国家青年的生活观和社会意识。因此，日本和韩国的抽样被限定在大学生群体范围。为了便于比较，中国的抽样也主要被限定在大学生群体。但考虑到中国的大学生在 1999 年扩大招生的情况下也才占同龄人口的 9% 左右，不像日本和韩国那样具有“代表性”，因此，课题组决定，在调查北京大学生的同时，也适当地调查一部分北京的职业青年。此外，考虑到中国还有相当大部分的青年按户籍划分，还属于农村青年，因此，又决定选取一定数量的农村青年样本。

2. 调查样本容量的确定

在简单随机抽样的情况下，当置信度设定为 95%，允许误差（抽样精度） Δ 控制在 3% 的情况下，样本容量 n 为： $t^2 (p \times q) / \Delta^2 = 1.96^2 \times 0.25^2 / 0.03^2 = 1067$ 。因此，课题组规定，每个国家的样本容量必须在 1000 人以上。

日本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京都，大阪为补充调查，其样本容量为 1200 人。具体分布为京都 1000 人，大阪 200 人。

韩国的调查分布在大邱和全州，但以大邱为主，其样本容量

为 1600 人。其中大邱 1000 人，全州 600 人。

中国的调查分为三个群体。调查以大学生为主，兼顾职业青年和农村青年。其样本分布为，北京市大学生 700 人，北京市职业青年 400 人，河南、山东农村青年共 600 人（各 300 人），总计样本容量为 1700 人。

3. 抽样的具体方法

为了保证被调查样本对于被调查地区青年的代表性，本课题在北京、京都、大邱、全州等三国四地的大学生抽样中，严格采用概率抽样的方法。具体的抽样方法为多阶段、分层、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

在北京的大学生抽样中，共分两层、四个阶段。

两层是指：

将北京市的 62 所高校按其性质属性分为两大类（即两层）：一类是理工、农业、林业、医药等院校（共 29 所学校）；一类是综合大学、师范、语文、财经、政法、体育、艺术、民族等其他院校（共 33 所学校）。由于总的抽样比为： $f = n/N = 700/200271 = 0.003495$ ，故第一层的层内计划样本规模为 389.2 人（ 111354×0.003495 ），第二层的层内计划样本规模为 310.8 人（ 88917×0.003495 ）。我们将第一级应抽单位数 PSU 定为 7（所学校），每所学校内的样本数初步定为 100 人。故：在第一层内应抽 4 所学校，每所学校实际抽取人数为 $389/4 = 97.3$ 人。而在第二层内应抽 3 所学校，每所学校实际抽取人数为 $310.8/3 = 103.6$ 人。

四个阶段是指：

第一阶段：从 62 所学校中抽取 7 所学校。其中，从第一类的 29 所中抽 4 所，从第二类的 33 所中抽 3 所。

第二阶段：从被抽中的学校中抽取 2 个系。

第三阶段：从被抽中的系抽取 2 个班。

第四阶段：从被抽中的班抽取大约 25 名大学生。

有关各阶段北京市大学生抽样的具体方法及其抽样结果详见附录 1-1。

日本和韩国大学生的抽样方法与北京市大学生的抽样方法基本相同，也是采用的 PPS 抽样。但日本京都大学生抽样在分层时还将大学多分了一个层次，分出了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日韩两国大学生的抽样结果见附录 1-4 和附录 1-5。

(三) 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

本次调查属于一种实证研究，所运用的具体方法如下：

1. 资料收集方法——问卷调查法为主，访问法为辅

在实证性的社会调查研究中，资料收集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最主要的资料收集方法有实验法、观察法、访问法和问卷法。上述各种方法都既有优点，同时也存在不足。因此，在他们中，本身并不存在谁最好或谁最差的问题。究竟选用何种方法，要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来决定。

从本次调查研究的目的来看，主要是想通过抽样调查来了解三国青年在社会意识方面的总体发展情况，并对之有一个定量的分析和定性的判断。因此，在上述四种方法之中，无疑是问卷调查法比较合适。但为了更准确地分析调查数据，当问卷统计的初步数据出来后，中日韩课题组的三国专家、学者，就其中部分题目的理解及其回答结果如何解释问题，分别于 1999 年和 2000 年夏天赴河南、山东被调查地区的乡村，通过群组座谈会的方式（每次由 10~15 名青年组成），与农村青年进行了深入细致地交谈。此外，课题组成员于 1999 年对韩国大学生也作了类似的访谈。

2. 问卷填答方式——自填式问卷调查

在问卷调查中，按填答方式划分可分为自填式问卷调查和面访式问卷调查。由于面访式问卷调查费时、费力，因此，本次调查采用的是自填式问卷调查的方式，即将问卷发给青年，让其自